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南通现代化： 1895~1938

NANTONG'S MODERNIZATION 1895—1938

常宗虎 著

53-0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南通现代化：
1895～1938

常宗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通现代化:1895~1938/常宗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7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沈志华主编)

ISBN 7-5004-2085-4

I. 南… II. 常… III. 经济史-研究-中国-南通-1895~1938 IV. F1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0039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875 插页:2

字数:180 千字 印数:1—1500 册

定价:11.00 元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学术评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周一良		
副主任委员	戴逸	齐世荣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庆成	王俊义	王思治
	刘桂生	刘家和	阮芳纪
	汪敬虞	张振鹞	张椿年
	何兆武	郑文林	金冲及

编辑委员会

主编	沈志华		
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沛	刘逊	李世安
	李丹慧	杨群	陈东林
	陈宝良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书目

1994 年度

《魏忠贤专权研究》，苗棣著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高王凌著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朱德新著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王中田著

《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沈志华著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李世安著

1995 年度

《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吴霓著

《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郭润涛著

《1895—1936 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陈争平著

《1949—1952 年中国经济分析》，董志凯主编

《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马龙闪著

《利玛窦与中国》，林金水著

《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 年)》，吕昭义著

1996 年度

《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许 檀著

《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吴吉远著

《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罗检秋著

《南通现代化：1895—1938》，常宗虎著

《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左玉河著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出版前言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资助项目难于面面俱到。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创业伊始,主要是切磋研究。但感到自己研究能力毕竟有限,于是决定利用自筹资金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有关东方历史的优秀研究成果出

版。凡入选的著作,均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作为丛书的总名。

我们这一举措,得到了老一辈史学家的鼓励,中青年同行的关注。胡绳同志为基金题词,在京的多位著名史学专家慨然应邀组成学术评审委员会,复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允承出版;全国不少中青年学者纷纷应征,投赐稿件。来稿不乏佳作——或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同类著作;或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百花齐放,绚丽多彩。这些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也增强了我们办好此事的信心。

资助出版每年评选一次。凡提出申请的著作,首先需专家书面推荐,再经编辑委员会初审筛选,最后由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论证,投票通过。但由于基金为数有限,目前每年仅能资助若干种著作的出版,致使有些佳著不能入选,这是一大遗憾,也是我们歉疚的。

大厦之成,非一木能擎。史学的繁荣,出版的困难,远非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解决其万一。我们此举,意在抛砖引玉,期望得到海内外企业界,或给予我们财务支持,使我们得以扩大资助的数量;或另创学术著作基金,为共同繁荣历史学而努力。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4年9月

序 一

汪敬虞

常宗虎博士的《南通现代化：1895—1938》一书，目的在于借助一个个案的研究，窥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用著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南通为例，寻找中国区域社会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某些规律”。他研究的对象虽然是南通一隅，但他的视野却相当全面。这里所说的全面，有两层意思。一是在这一个案研究中，他考察的范围比较全面；二是在问题的分析中，他提出的观点也比较全面。因此，本书作为进一步探讨整个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史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相当结实的。

关于第一个全面：本书著者十分重视社会史的研究。他认为：“史学研究应以总体史为目标”，而“社会史的基本准则是全方位、跨学科地追求总体史的建立”。因此他考察南通的现代化，不像通常那样局限于经济，而把考察的视野扩大到教育体制、社会结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他不是孤立地考察南通的产业化，而是倒过来以南通的现代化为中心作辐射式的全面考察，摒弃了单纯经济考察的模式。

关于第二个全面：这里可以引张謇的评价为例。考察南通的现代化，离不开张謇的活动。他的大生系统，是南通现代化的一面旗帜，他的全部事业可以说是南通现代化的主体。而对张謇的研究，现在是学术论坛上的一个热点。从建国前后一直到现在，将近半个世纪，学术界对张謇的评价，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最早人们

把张謇归入官僚资产阶级,他的企业划入官僚资本。也就是说,把张謇摆在反动派的地位,这显然是违背历史的。现在人们对这一看法做了修正,这有助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在重新评价的讨论过程中,也出现了不一致的看法。其中有的看法,把张謇的历史作用提到不适当的地位。本书全方位地观察张謇,看法比较全面,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

以上是从总体上对本书所做的两点评析。其中第一点也许问题不大,第二点则可能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为了着重分析本书著者在这方面的观点,这里有必要做一点适当的展开。它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事例入手。

人们都熟悉:为了解决大生纱厂的原料问题,张謇在苏北搞了一个以植棉为主的通海垦牧公司。这个占地九万余亩的农垦公司,真正由公司雇工经营的不足5%,95%以上的垦地,仍是分给公司股东个人租给个体农户耕种。对于这种形式的农垦公司,应该怎样加以评价,存在不同的看法。本书著者认为:这里反映的问题是公司的资本不足,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经营。书中列举的事实根据是:公司在开垦荒滩时,一则要佃农先出劳工,二则要佃农交纳“顶首”,即租地押金。这两项(即佃农的租地押金和劳动折价)加起来,共占公司资本的63%,公司自筹资本只有37%。著者在这里下断语说:“前两项几乎是赤裸裸的封建剥削,从内容到实质与当地流行已久的‘崇划制’,别无二致。”

对于这一点,现在有不少论者不是这样看的。其中截然相反的看法是:张謇创办这种类型的农垦公司,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通过这种组织,将代表大工业的纱厂、代表大农业的农垦公司和传统农民家庭农业联为一个相互支撑的整体。它不是在破坏或者削弱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发展新式产业,而是找到了一条既可充分利用先进国家已取得的成就,又可最

大限度地避免破坏损失,以最低代价追赶先进的路子。这是既能坚持弘扬中华传统之精华,又努力汲取外来先进事物的范例。

这个看法之是否合乎实际,至少有两个可供判断的标准。一是要看在农垦公司系统内,作为公司佃户的传统农民家庭经济地位是否得到改善,二是要看在农垦公司以外的整个农村经济状况是否得到改进。从这两方面看,应该说,结论都是否定的。

从佃农的经济地位看,农垦公司的佃农和原先的佃农,可以说基本上并无二致。他们所交的地租,在租率上没有显著的差别。不仅如此,现在佃农除了以棉花交租以外,还要把余棉卖给公司。他与原来的佃农不同的是:他的产品,只能卖予公司,不能自由投向市场。也就是说,他的处境更加依附于公司,除了受地租的剥削以外,还更加容易受商业高利贷的剥削。

从整个农村经济状况看,农垦公司有它正面的积极效应。本书著者以大量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大片滩涂变成了良棉基地,垦区由人烟罕至变成日趋开发的富庶地区,原有灶民和移民生活的改善,棉产额的上升和单产水平的提高,在表明农垦公司所产生的正面效果。但是与此同时,著者又以事实证明:“一方面沿海开发推动了全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专业化与商品化程度加大,另一方面,广大农村的贫困化趋势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这一切都没有引发农村经济的任何实质性发展。相反,通海农村经济在起伏中反呈衰败态势。”

由此可见,即使承认棉垦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整个农村经济也看不出改进的迹象。原因是,张謇的所作所为,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小农的固有地位。把落后制度下的小农经济当作中华传统之精华,这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取向,是不相适应的。本书著者认为,不能“把落后导致的结果当成落后存在的理由”。这种提法,是相当深刻的。当然,前一种意见也是经过

深刻思考的结晶。两种看法的并存和讨论的开展,无疑有助于对旧时代中国现代化历程认识的加深。

就本书的全部而言,著者的审视角度,显然不止于此。他从总体史的高度看问题,认为张謇式的南通现代化之所以未能实现,根本的原因是张謇对“中体西用”论的固守。南通现代化的最终结局为“中体西用”论在实践中必然碰壁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实例。这从本书中可以找到足够的论证。

第一,张謇在南通大搞资本主义建树的同时,却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在南通的自由竞争和自由发展。他自己可以在南通地区放手设立纱厂,纱厂所产棉纱也可以在南通境内外放手销售,但是他却不许外部势力进入南通。他不但坚决抵制外地资本家在南通设立纱厂,而且对外地纱厂生产的棉纱在南通销售,也设置了重重的障碍。可以这样说:南通对张謇而言,是资本主义的乐园;对张謇以外的人而言,又是资本主义的禁地。而张謇在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作用上,是既开风气于先,又扼自由竞争于后。

其次,在兴办教育方面,同样可以看出存在于张謇身上的矛盾。他很重视教育。正如本书著者所说:“在张謇的救国方案中,实业是先导,教育是核心。”他在革新教育方面,显然是有成绩的。他很重视女子教育。在1902年创立通州师范学校之后四年,又专门设立了一所女子师范;随后又在1914和1920年分别设立女工传习所和女子蚕桑讲习所。此外,还设立了女子职业实习学校。可以说是开女子教育的先河。但是就在他全力兴办女子教育的同时,对提倡“男女平权”、“男女同学”、“男女学生自由”却一概反对,视为“害人之时疫”。尤其奇特的是:他对自己的一位“小妾”之死,拒不治丧。原因是这位“小妾”未曾给他生育儿子。他引“嫡子于父无子之妾无服”为据,表示他这样做是不敢“违礼”。这种言论和他的创办女子教育的行动,看起来是尖锐的矛盾,然而在张謇身上,却得

到和谐的统一。

矛盾的突出和它在张謇身上和谐的统一，来源于张謇思想上“中体西用”论的根深蒂固。对所有这些矛盾的出现，本书著者都提到“中体西用”论的范畴内予以阐述和评析。新式企业的创办，这是“用”；封建特权垄断的维护，这是“体”。新式学校的建立，这是“用”；旧礼教的维持，这是“体”。“中体西用”虽然有用“西”的一面，但它是在维护“中体”的原则下采纳“西用”的，在“西用”的过程中又时时提防西学的“用”危及中学的“体”。两者只是进行简单的嫁接，从“中体”这条根子上是长不出中国的真正现代化的。张謇的一切活动，都没有超出“中体西用”的范围，相反，它正是“中体西用”论在实践中的范例。著者的这种论断，是切中要害的。因为这一论断，不但注定了张謇毕生从事的事业最后以失败告终，而且注定了张謇时代的中国没有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可能。

当然，张謇仍然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先进者。他的脚步留下的，不失为一个“开拓者”的足迹。但是，尽管如此，他毕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旧时代的中国的面貌。他毕生奋斗所留下的足迹，仍然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地上。

本书著者是一位社会史专家。他对社会史的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中国当前社会史研究的现状，也有自己的全面评价。在充分肯定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贡献与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实践中存在的缺陷。其中之一就是“专题研究中视野相对狭窄，阐述、分析、综合时就事论事，缺少建立总体史的准备”。本书之作，可以说是他对自己的理念提出的第一个实践。这是可喜的一步。我们希望，同时也相信，他能够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序 二

王 庆 成

常宗虎同志的书稿《南通现代化：1895—1938》将要作为“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的一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稿是由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修订补充而成。我是他读博士研究生时期的导师，他要我为他的第一本书写一篇序，这自然是不容推辞的。不过，说些什么却大费斟酌。这里，我就约略谈谈这些年同常宗虎、同他的几位师兄弟探讨学业时的一些感受。

汪先生的序中说，本书著者十分重视社会史的研究，的确如此。常宗虎在学习期间就写过关于社会史对象、方法之类的论文，并与同行有所讨论。研究社会史是他和我共同的兴趣，我招收研究生就是以近代社会史为方向的。我的这种愿望始于70年代末。我记得是1979年或1978年，那时有法国国家科学发展中心的三人代表来访，我随同近代史研究所两位年长同志一起与他们交谈。一位法国朋友忽然问：你们说你们遵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著作主要研究社会、经济，而你们的研究却着重于人物，特别是变来变去的人物评价，这样对吗？我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已从各种动态性的材料中学到了一些新知识，久有郁积的想法忽然得有开朗：的确要遵从马克思主义，要多从社会、经济方面去观察近代史。几年后，我曾负责七五社会科学规划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小组，在正式工作前，有关同志要我先草拟一些想法提供小组讨论。我不知何来这样大的勇气，撇开大家熟悉的题目，提出要研究近代中国的农

村、城市、边疆等。不久,认识国情的问题提出了,这更使我体会到,历史研究之所以可能为社会重视,是因为有助于认识国情、历史上的国情;社会史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倡,不仅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城市史研究今已蔚为大观,近代农村研究亦已卓有成就。但我自己的工作太不得力。个人的研究谈不上,应做的组织工作也未都实现。差可告慰的是,先后从我学习的几位研究生都很勤奋,对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各有自己的体会,学习成绩相当不错。社会史究竟研究什么,过分拘泥于定义似可不必。我记得十几年前美国学者刘广京先生在近代史所演说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历史的状况和趋势,他介绍说,当代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几位代表人物,如魏斐德(F. Wakeman),是以社会史的方法而研究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外交史,孔飞力(P. Kuhn),研究19世纪后半期的团练而说明了中国社会阶层关系的变化。刘先生说,魏、孔几位开创了美国研究中国史的第二代。照中国学者的看法,此后美国研究中国史,几乎都是社会史。这样看来,提倡研究社会史,力求确定它的专门对象,固然是应有之义;但这不是说,只有明确了它的专门对象才能研究社会史。我在大学读过社会学原理这门课程,老师介绍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社会学,说法无虑数十种,这没有妨碍我们学生读课本、写作业。对于社会史,我想也是这样。鸦片战争、地方团练,都是政治军事问题;但如观察到与它们联系的社会动态而加以研究,那就成了新问题、新研究。一些朋友知道我对太平天国有兴趣,我写过一本关于它的历史和思想的书,它自然是一本关于太平天国的书,但一位在外国的资深华人史学家读后对我说,这是一本社会史、文化史的书。所以,我想社会史研究什么之争可以从长计议,重要的是开阔视野,改进研究的方法。这是我和几位研究生的共识。他们在写作学位论文时,都能既选好研究的对象,又注意研究的方法。常

宗虎对张謇事业的研究,以前已有基础,使他为写好学位论文和这部书稿具备了较好的条件;现在之所以能从以前的研究达到新的水平,是由于他掌握了若干新的知识,使他能从另外的视角去观察历史,思考问题,这样就使原来的研究变成了新的研究。视角、方法的理解、改进、运用,依靠于知识的积累和思想能力的提高;否则,即使被告知应该运用某种方法,也是难以操作自如的。知识和思想能力不是同一的事物,但思想能力的提高也离不开积累知识。所以,对于研究工作,可以说,知识就是力量,研究历史而具备理论的和各种社会科学的知识,那就有可能走入新境界。常宗虎学习勤奋,思想活跃,求知欲旺盛,他的书稿能通过汪敬虞先生的审查,这正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

常宗虎认为,社会史的成功在于它对总体史的关怀,对现代化的研究是靠近这一目标的较好选择。这见解有道理,但还值得细细琢磨。总体史的说法太笼统,而且相对于总体的分体的研究不可缺少。这使我想起大学时代读周谷城先生的《中国通史》。书的导论是一篇题为“历史完形论”的长篇论文,主张历史应以人类的活动为对象,史书要维护它的完整性、全体性。周予同老师是谷城先生的好友,他在课堂上讲述了历史完形论,但认为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不可能都达到完形。现代化研究似乎涉及社会现象的各方面,但研究一个时期、一个地区,仍然难说是总体。不过常宗虎重视社会史研究与现代化研究的密切关系,这是我赞成的。现代化研究在近十多年的中国学术界受到了重视,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他的学位论文和这部书稿的题目的选定,受惠于这一研究的发展。“现代化”有自己的科学含义,不必担心与日常用语混淆。中国的现代化在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有新的大规模的开展;同时,很多学者也都承认现代化的过程在此以前已经缓慢地开始,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不少人在这一过程中有所努力、有所

表现、有所活动。张謇的活动就表现为江苏南通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进步和问题。张謇的“村落主义”和稍后中国许多地方的“实验区”活动，各有自己的色彩，要之都为研究中国现代化历史提供了值得回顾的课题。常宗虎的书稿有一章专门讨论南通道路的成功和失败，其分析，看来有说服力。成功失败的原因，当然要从张謇和南通的范围内作分析，但也要看到南通以外的因素。中外有过或仍然有许多社会实验，不仅是现代化实验，也有“复古”实验，它们也许都可以存在一段时间。“复古”实验当然会失败——它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现代化“村落”实验之成功、推广，或失败、消失，实验区以外的大环境的作用是不容忽略的。

近十年来，我已担任过若干位研究生的导师，指导他们写学位论文，题目大抵与社会史多少有些关系。认真说来，我的指导是不及格的。记得十几年前我受命担任近代史所的经济史室主任几年，我的知识实在不够，只有求助于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史室。严中平、彭泽益、吴承明、汪敬虞、张国辉、宓汝成诸先生给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记得一次与严中平先生谈起请他们帮助代招研究生，他似乎很认真地说：研究生可不好带，学位论文怎么指导啊？自己研究过的问题，不用学生再去做；自己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怎能指导学生？严老先生学识博大精深，这是他的风趣话。对我来说却颇为切合。常宗虎和其他几位的论文题目，我自己都没有专门研究，只能在研究工作的经验上给他们一些助力。就专门研究来说，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往往如严老先生所说的那样；当然，研究工作经验的传授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重要的。我的导师工作不久将要划上句号，在此时回忆与常宗虎和其他同学共同探讨学业的经历，希望互相都有得益。

1996年12月30日

• 9 •